



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重大项目成果丛书

Publication Series: MOE Supported Projects of Key Research Institutes of 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s in Universities

藏彝走廊丛书

石 硕 主编

胡系民族与藏彝走廊

—— 以蒙古族为中心的历史学考察

曾现江 著

Zy

藏彝走廊研究丛书



四川大学“985工程”二期

南亚与中国藏区研究创新基地

四川大学“211工程”

中国区域历史与文化

四川出版集团 四川人民出版社



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重大项目成果丛书

胡系民族与藏彝走廊

—— 以蒙古族为中心的历史学考察

曾现江 著

四川出版集团 四川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胡系民族与藏彝走廊/曾现江著. —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 2007. 12

(藏彝走廊研究系列丛书)

ISBN 978—7—220—07523—0

I. 胡… II. 曾… III. ①古代民族—民族历史—中国
②藏族—民族历史—研究—中国 ③彝族—民族历史—研究—中国 IV. K289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7)第 202026 号

HUXI MINZU YU ZANGYI ZOULANG

胡系民族与藏彝走廊

——以蒙古族为中心的历史学考察

责任编辑

张 萍 傅 瑞

封面设计

康 燕

技术设计

戴雨虹

责任校对

叶 勇

责任印制

丁 青 李 进

出版发行

四川出版集团(成都槐树街 2 号)

网 址

四川人民出版社

<http://www.scpph.com>

<http://www.scrmcb.com.cn>

E-mail: scrmcb@scinfo.net

(028)86259459 86259455

(028)86259524

发行部业务电话

成都华宇电子制印有限公司

防盗版举报电话

四川锦祝印务有限公司

照 排

146mm×208mm

印 刷

7.75

成品尺寸

200 千

印 张

2007 年 12 月第 1 版

字 数

2007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版 次

ISBN 978—7—220—07523—0

印 次

28.00 元

书 号

定 价

■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本书若出现印装质量问题,请与我社发行部联系调换

电话:(028)86259624

序 言

1980年前后，时值十年“文革”刚刚结束，我国各行各业生机焕发、百废待兴之际，费孝通先生以高度的时代责任感对建国三十年我国民族研究的得失进行总结与反思，以敏锐的学术眼光一针见血地指出，过去民族研究领域普遍存在的按行政区划和以单一民族为单位进行研究的状况有着很大局限性，难以开拓我国民族研究的新局面。鉴于此，费孝通先生提出一个具有方向性的新思路——按照“历史形成的民族地区”来进行中国的民族研究。“藏彝走廊”概念正是在这一背景下，由费孝通先生将其作为中国民族格局中一个独特的“历史—民族区域”提出来的。藏彝走廊在地理单元上主要指川、滇、藏三省区毗邻地区由岷江、大渡河、雅砻江、金沙江、澜沧江、怒江六条自北向南流的大江及一系列同样呈南北走向的山系所构成的高山峡谷区域。由于该区域在地形上呈东西相对屏闭、南北相对开放的走廊形态，所以，这里成为一条古代的民族迁徙走廊，尤其成为历史上西北与西南各民族间交往联系的重要孔道。藏彝走廊地区不但是藏缅语民族起源、发展、融合和分化演变的主要历史舞台，还是目前我国民族种类最多、支系最复杂、民族文化原生形态保留最好的地区，其民族



文化具有突出的多样性、独特性并沉积大量古老的历史遗留，在我国民族区域格局中极具典型意义。

20世纪80年代初，刚成立的中国西南民族学会曾积极响应费孝通先生按照“历史形成的民族地区”进行民族研究之倡议，在李绍明、童恩正等一批研究西南民族、考古的资深学者的带领下组织发起过“六江流域民族综合考察”，这是首次将藏彝走廊作为整体民族区域进行研究的一个尝试，也揭开了中国民族领域对历史一民族区域进行整体和综合研究的序幕。“六江流域民族综合考察”取得不少阶段性成果，但后因经费等原因而未能持续。

近几年，藏彝走廊的研究日渐活跃并受到学术界的重视。2003年四川大学中国藏学研究所与中国西南民族学会在成都召开“藏彝走廊历史文化学术讨论会”，并出版论文集《藏彝走廊：历史与文化》（四川人民出版社，2005）一书；2005年四川大学中国藏学研究所与美国爱荷华州立大学共同举办“藏彝走廊族群互动中美学术合作研讨会”。这些活动使藏彝走廊研究日渐受到重视。2005年国家社科基金将藏彝走廊研究列入课题指南，并于当年将由我申报的“藏彝走廊的民族互动与文化发展”课题批准为国家社科基金重点项目。2008年将于昆明召开的世界民族学人类学世界大会还将“藏彝走廊”这一课题正式列为大会的分论坛之一。目前国内一些主要民族研究机构如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学与人类学研究所、北京大学社会学人类学研究所、中央民族大学、四川省民族研究所、西南民族大学、四川省康藏研究中心、云南省社会科学院等都积极介入和开展了藏彝走廊的研究。笔者相信，藏彝走廊这一片中国民族资源富集的沃土，诚如费孝通先生所言：“对这条走廊展开文献和实地田野考察，民族学、人类学、民族史学家能看到民族之间文化交流的历史和这一历史的结晶，从而能



对‘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有一个比较生动的认识。”^①

鉴于上述学术背景，为更好地开展藏彝走廊研究，将该区域的研究逐步引向深入，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四川大学中国藏学研究所决定组织出版这套“藏彝走廊研究系列丛书”。本丛书将本着注重原创性、学术性和专题性的原则，以学术质量为第一要义，宁缺毋滥，力争在数年内推出一批高起点、高水平的藏彝走廊研究成果。

这套“藏彝走廊研究系列丛书”从组织、研究与出版，得到了四川大学985工程“南亚与中国藏区”创新基地、四川大学“十五”“211工程”子项目“中国区域历史与宗教文化”以及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基金的资助，特致谢忱！

四川大学中国藏学研究所 石 硕

2007年7月于川大江安花园

^① 引自费孝通《“给‘藏彝走廊’历史文化学术讨论会”的贺信》，载石硕主编：《藏彝走廊：历史与文化》，四川人民出版社2005年，第1页。

目 录

第一章 絮 论	(1)
第一节 胡系民族与藏彝走廊——课题的提出	(1)
第二节 本书的资料来源、研究难度及书写结构	(13)
一、资料来源	(13)
二、本课题的研究原则、思路及本书的书写结构	(15)
第三节 藏彝走廊的地理范围及其在蒙古族进入前的历史面貌与发展趋势	(18)
一、对藏彝走廊地理范围的设定	(18)
二、13世纪蒙古族进入前，藏彝走廊的历史面貌及发展趋势	(22)
第二章 1260年以前蒙古对藏彝走廊地区的军事征服行动	(36)



第一节 先取西南诸蕃，藉以图金	(37)
一、“先取西南诸蕃，藉以图金”的提出及其初步实践	
	(37)
二、对几则蒙古与大理国早期关系史料的考辨	(43)
第二节 先取西南诸蕃，斡腹攻宋	(51)
一、为捣虚之计	(51)
二、“迂回大理，斡腹攻宋”的提出及初步实践	(55)
三、“九禾之战”及战后蒙古在藏彝走廊地区的军事活动	
	(58)
四、忽必烈远征及蒙古初步完成对藏彝走廊地区的军事征服	(64)
五、简评蒙古征服藏彝走廊地区	(71)
第三章 蒙元对藏彝走廊地区的治理	(74)
第一节 蒙元在藏彝走廊地区设置的地方机构	(75)
一、吐蕃等处宣慰司都元帅府所属	(76)
二、吐蕃等路宣慰司都元帅府所属	(78)
三、云南行省内与藏彝走廊地区相关的地方机构	(80)
第二节 蒙元在藏彝走廊地区的统治方略及其实施	(81)
第四章 明代的蒙古族与藏彝走廊	(87)



第一节 明初蒙古族对藏彝走廊地区的影响	(87)	
一、明初遗留在藏彝走廊地区的残元势力	(87)	
二、塞外蒙古族对藏彝走廊地区的影响	(91)	
第二节 明中期东蒙古诸部向藏彝走廊地区的扩展	(95)	
一、入据青海的东蒙古诸部在藏彝走廊的势力拓展	(96)	
二、东蒙古诸部进入藏彝走廊地区活动的特点、目的及影响	(103)	
第三节 蒙古族及藏传佛教格鲁派势力的扩张对藏彝走廊地区政教格局的影响	(107)	
 第五章 和硕特部对藏彝走廊地区的经营		(114)
第一节 和硕特蒙古势力在藏彝走廊地区的扩展	(115)	
一、和硕特蒙古的南迁	(115)	
二、罕都在康区的活动	(120)	
三、罕都对藏传佛教格鲁派的背叛	(127)	
四、木虎年事件	(132)	
第二节 和硕特蒙古在藏彝走廊地区统治的瓦解	(140)	
一、吴三桂叛乱期间和硕特蒙古势力在藏彝走廊地区的扩展	(142)	
二、西炉之役	(149)	
三、和硕特蒙古在康区南部统治的动摇	(153)	



四、罗卜藏丹津叛乱——蒙古族彻底失去在藏彝走廊地区的一切统治权益	(160)
第六章 对藏彝走廊地区若干胡系民族文化遗存的分析	(167)
第一节 与蒙古族相关的祖源记忆与传说	(168)
一、木雅地区的蒙古王传说	(170)
二、丹巴县梭坡乡的蒙古族祖源传说	(173)
三、果洛、瓦述等游牧部落的蒙古祖源传说	(175)
四、滇西“本人”的北方耶律氏祖源记忆	(177)
五、康北霍尔人的族源及其演变	(182)
六、川滇边地各民族的蒙古族祖源传说	(196)
七、铁改余（渝）传说	(207)
第二节 对这些文化遗存的几点说明	(209)
第七章 结语	(211)
征引文献	(217)
Abstract	(235)
后记	(238)

第一章 緒論

第一节 胡系民族与藏彝走廊 ——课题的提出

“藏彝走廊”是已故著名民族学家、社会学家费孝通提出的一个历史—民族区域学术概念，它北起甘青黄土高原，南连云贵高原，主要指我国西南及西北地区的甘肃、青海、四川、西藏、云南等省（区）的毗连区域。怒江、澜沧江、金沙江、雅砻江、大渡河、岷江等大江大河自北而南流过该区域，造就了若干天然河谷通道，成为古代众多民族南来北往、迁徙活动的场所，是历史上西北与西南各民族之间乃至北方与南方沟通往来的重要通道。现在在藏彝走廊地区，生活着藏、彝、羌、白、纳西、傈僳、普米、独龙、怒、哈尼、景颇、拉祜、基诺、阿昌、门巴、珞巴等属于藏缅语族的民族，同时还居住着壮侗语族中的傣族和壮族、苗瑶语族中的苗族，也有汉、蒙、回诸民族，乃至孟高棉语族中的一些族体，以及一些有待进一步识别的人群，而且在许多民族内部还有着众多的复杂支系。近代以来，该区域特殊的地理环境



和丰富的历史人文内涵逐渐引起了人们的注意，被称为“氐羌走廊”、“汉藏走廊”、“川西民族走廊”、“横断山区民族走廊”等。费孝通先生在1980年前后的几次谈话中，将该区域命名为“藏彝走廊”^①，并着重提醒人们：“把这走廊中一向存在着的语言和历史上的疑难问题，一旦串联起来，有点像下围棋，一子相连，全盘皆活。这条走廊正处于彝藏之间，沉积着许多现在还活着的历史遗留，应当是历史与语言科学的一个宝贵的园地”^②。在费孝通等一批前辈学者的直接推动下，中国西南民族研究学会在20世纪80年代组织了“六江流域民族综合考察队”，先后在雅砻江下游、怒江中游、雅砻江上游等区域展开了一系列的科学考察，学科领域包括民族学、民族史、民族语言学、社会学、考古学、体质人类学等，从而掀起了一次关于藏彝走廊的研究高潮^③。近年来，尤其是随着2003年四川大学中国藏学研究所和中国西南民族研究学会共同发起的“藏彝走廊历史与文化学术讨论会”的召开，国内外学术界关于藏彝走廊的研究再次趋于活跃。

毫无疑问，民族迁徙是藏彝走廊最为重要的历史现象，也自然是藏彝走廊研究的重要内容。在藏彝走廊民族迁徙史上，既有北方民族的南下，也有南方民族的北上。相对而言，北方民族的南下迁徙活动更频繁、更复杂，影响更为深远，当然也受到学术

^① 费孝通将几次谈话内容整理形成三篇论文，分别是：《关于我国民族的识别问题》（《中国社会科学》1980年第1期）、《谈深入开展民族调查问题》（《费孝通民族学研究文集》，第295~305页，北京：民族出版社，1988年）、《民族社会学调查的尝试》（《从事社会学五十年》，第268~285页，天津人民出版社，1983年）。

^② 费孝通：《关于我国民族的识别问题》，《中国社会科学》1980年第1期，第158页。

^③ 李绍明：《“藏彝走廊”研究与民族走廊学说》，石硕主编《藏彝走廊：历史与文化》，第3~12页，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2005年。



界更多的关注。南朝刘宋史家范晔在《后汉书·西羌传》中记载：公元前4世纪左右，生息于河湟一带的羌人迫于秦国西向扩张的压力，“附落而南”，有的西进，有的南下；其南下者，“或为髦牛种，越巂羌是也；或为白马种，广汉羌是也；或为参狼种，武都羌是也”。受此记载的启发，学者们通过梳理古代典籍、排比考古文化等多种途径，努力追溯西北甘青地区的“氐羌人群”在藏彝走廊的南下迁徙历史。也有不少学者通过对大量民族学调查材料的综合分析，发现：目前生活在藏彝走廊地区的各藏缅语族民族基本上都有着一部由北向南的迁徙历史，并保留着大量反映这种迁徙历史的文化现象^①。近年来，随着生命科学的发展，尤其是基因技术、DNA提取技术取得的突破性进展，科技工作者们不但“从体质人类学的角度证实了‘藏彝走廊’的存在”^②，而且在关于东亚人类的起源及早期迁徙活动的研究中还发现：大约6000年前，藏缅语族的祖先由黄河中上游向西而后向南迁徙，通过藏彝走廊进入中国西南以及青藏高原繁衍生息^③。这些研究成果无疑为西北“氐羌人群”沿藏彝走廊的南下迁徙历史增添了新的科学证据，也为藏彝走廊民族迁徙研究提供了新的思路。

然而，影响藏彝走廊的形成及历史发展、演变的北方民族，

^① 蒙默：《试论汉代西南民族中的“夷”与“羌”》，《历史研究》1985年第1期；李绍明：《西南丝绸之路与民族走廊》，《李绍明民族学文选》，成都出版社，1995年，第868~883页，石硕：《藏族族源与藏东古文明》，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2001年，第55~65、100~103页。

^② 泸州医学院：<http://www.lzmc.edu.cn/jingpin/jingpinjiepou/keyan/kyjg.htm>。

^③ 中国科学院昆明动物研究所：<http://www.kiz.ac.cn/newsite/solicit/Su-Bing.htm>；新华网上海频道：http://www.sh.xinhuanet.com/2003-04/05/content_366711.htm。



并不仅仅局限于西北甘青地区的氐羌人群，更有来自北方欧亚大草原（Eurasian Steppes）上的游牧民族。斯基泰人——匈奴人——突厥人——蒙古人，先后成为大草原上的主宰。作为游牧民族，他们的历史重要性主要不在于他们所建立的一个接一个往往是昙花一现的草原帝国，而在于他们冲出苍茫的大草原，对草原以外的地区所施加的巨大压力，这种压力持续不断地影响着古代欧亚大陆历史的进程。在古代中国，对于这些来自北方的游牧民族，华夏人群惯常用“胡”来称呼他们^①。一般说来，中国古代民族史上的“胡系民族”可以划分为三个系统：东胡系统的乌桓、鲜卑、柔然、室韦、契丹、奚、蒙古等民族；匈奴系统的匈奴、月氏、乌孙和西域诸族；突厥系统的丁零、敕勒、铁勒、突厥、回鹘、畏兀儿等民族^②。

在青铜时代甚至更早，诸多来自欧亚大草原的文化因素相继出现在藏彝走廊地区，或通过藏彝走廊进一步向外传播，这一文化现象很早就为考古学家所察觉。作为岷江上游流域石棺葬的早期主要发掘者，著名考古学家冯汉骥教授在1951年撰文，推测当

^① 华夏人群早先主要是使用“狄”或“北狄”来统称北方的游牧民族，称之为“胡”约始于战国时期，至战国后期，北方游牧民族一般都被称为“胡”。何以称北方游牧民族为“胡”？冯家升谓“胡系匈奴之急读”；日本学者白鸟库吉认为“胡”系匈奴首音之省略；还有人认为“胡为匈奴之异写”，后来秦汉称匈奴为“胡”，匈奴亦自称“胡”，这也证明“胡”与匈奴是同族异称。当然，除了专指北方的游牧民族外，“胡”有时也是对非华夏民族的泛称。参见俞伟超著《古代“西戎”和“羌”、“胡”考古学文化归属问题的探讨》（俞伟超著《先秦两汉考古学论集》，第189~192页，北京：文物出版社，1985年）；田继周著《秦汉民族史》（成都：四川民族出版社，1996年，第48~49页）。

^② 也有学者将其划分为五个系统，参见林幹著《中国古代民族通论》（呼和浩特：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98年）。



地石棺墓的主人可能是从西北南下的月氏人^①。随后不久，云南晋宁县石寨山出土了大批属于青铜时代的文物，其中的青铜器图像上有身着窄长衣裤、脚穿皮鞋、须长过腹、高鼻深目的人物形象，这同样引起了冯先生的注意，他认为这些人物形象所反映的均非西南民族的一般习惯，而“多与西北的游牧部落有关”^②。随着考古工作的深入，滇文化中更多带有北方草原文化因素的遗物相继被发掘出来，从而引起了更多中外学者的瞩目。云南的考古学家张增祺通过综合对比，发现公元前3世纪左右的滇文化明显受到了斯基泰文化的影响，影响所及范围包括洱海及滇池以北的地区。如下一些器物：动物搏斗纹铜饰、骑马猎手图像、杖头铜饰、铜铠甲、石坠、镂孔勺形铜器、旋纹金饰及金片、金项饰、铜柄铁器及金剑鞘、牛角杯等，都可以被认为是斯基泰文化的遗物。对于滇文化中斯基泰文化因素的来源，张增祺认为是在公元前3世纪前后，遭到匈奴攻击的大月氏西迁，迫使游牧在西域的塞种人（斯基泰人的一部分）分离远徙，有的通过新疆、青海等地，沿横断山脉的河谷通道进入滇西地区，从而将欧亚东部草原上的斯基泰艺术带入中国西南^③。另一位著名考古学家童恩正教授则对出土器物的类型、风格、建筑遗迹、葬具、葬俗等方面考古学因素进行对比分析，探讨我国东北到西南地区之间古文化的内在联系，试图更加具体地回答早期北方草原文化是如何传播到西南地区的。

① 冯汉骥：《岷江上游的石棺葬文化》，《成都工商导报·学林》第十期，1951年5月20日。

② 冯汉骥：《云南晋宁石寨山出土文物的族属问题试探》，《考古》1961年第9期，第485页。

③ 张增祺：《滇国与滇文化》，昆明：云南美术出版社，1997年，第274～287页。



他发现，东起大兴安岭南段，沿蒙古草原至河湟地区；再折向南方，沿青藏高原东部直抵滇西北，在这样一个半月形地带内，从新石器时期晚期直到铜器时代，存在着许多共同的或相似的文化因素，包括细石器、石棺墓、大石墓——石棚、石头建筑遗迹以及其他一些文化因素。童教授认为，之所以会出现诸多共同的或相似的文化因素，除了直接的民族迁徙、融合与交往外，还在于上述地带存在着一条边地半月形文化传播带，经由这条文化传播带，北方草原文化的许多因素传播到西南地区^①。

除了在考古文化上有所反映外，我们还可以在古籍中找到秦汉以来胡系民族进入藏彝走廊活动的一些蛛丝马迹。

据《史记》记载，西汉初年，原居于敦煌、祁连之间的月氏人被匈奴击破后，大部分西迁，余部则进入南山（祁连山），被称为“小月氏”^②。《后汉书》又记载：小月氏人后来进一步南徙，至少推进至青海湟中地区，与当地的“羌人”杂居，遂有“月氏胡”^③、“小月氏胡”^④以及“湟中胡”^⑤等别称。后来学者认为：匈奴帝国瓦解后，匈奴别部和从匈奴部族中分解出来的部落被惯称为“杂胡”、“杂种胡”，而属于东胡系统的鲜卑及其别部则被惯称为“虏”^⑥。东汉至魏晋时代，中国古代民族大迁徙、大流动，有相当数量的“杂胡”及“虏”出现在藏彝走廊地区。《后汉书》

① 童恩正：《试论我国从东北至西南的边地半月形文化传播带》，《南方文明》（童恩正文集·学术系列），第558~603页，重庆出版社，1998年。

② 《史记》卷123《大月氏列传》，北京：中华书局，1959年，第3162页。

③ 《后汉书》卷87《西羌列传》，北京：中华书局，1973年，第2899页。

④ 《后汉书》卷16《邓禹列传附子训传》，第609页。

⑤ 《后汉书》卷87《西羌列传》，第2897页。

⑥ 唐长孺：《魏晋杂胡考》，见唐长孺著《魏晋南北朝史论丛》，第368~434页，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00年。



卷 86 《冉駹夷传》载：

冉駹夷者，武帝所开。元鼎六年，以为汶山郡。……其山有六夷七羌九氐，各有部落。……其西又有三河、槃于虏，北有黄石、北地、卢水胡，其表乃为徼外。

“黄石”是最早见于东汉初年的“杂胡”，当时居于武威（今甘肃武威）一带^①。“卢水”亦是见于东汉初年的“杂胡”，初居临羌（今青海西宁）附近^②。《晋书·沮渠蒙逊载记》说：“沮渠蒙逊，临松卢水胡人也。其先世为匈奴左沮渠，遂以官为氏焉。”但据唐长孺先生研究，卢水胡可能是匈奴别部，其族源估计与小月氏有关^③。“北地”可能是指原居于北方的“杂胡”。当然，原文的正确标点也可能是“黄石、北地卢水胡”，而不是目前中华书局标点本所标点的“黄石、北地、卢水胡”。三河、槃于虏的具体情况不清楚，无法确定他们究竟是鲜卑还是鲜卑别部，亦或正确的断句应该是“三河槃于虏”。上述这些“杂胡”和“虏”出现在汶山郡，理应是胡系民族南下迁徙的结果。

常璩在《华阳国志》中也为我们留下了不少关于各种“杂胡”、“虏”在藏彝走廊地区迁徙活动的记载^④。其卷3《蜀志》载：

^① 《后汉书》卷76《循吏列传·任延传》载：任延为武威郡太守时，“令将杂种胡骑休屠黄石屯据要害，其有警急，逆击追讨”（第2463页）。

^② 《后汉书》卷87《西羌传》，第2800、2801页；卷23《窦融传附弟子固传》，第810页。

^③ 唐长孺：《魏晋杂胡考》，第397～398页。

^④ 《华阳国志校注》，刘琳校注，成都：巴蜀书社，1989年，以下同。